◆军事战略

着眼国家安全战略需要谋划空间力量发展

□刘建国

空间是为人类发展带来巨大利益的重要领域，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科技及军事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进入新世纪，空间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军事应用领域的地位作用越来越重要，世界各国发展空间力量、争夺空间资源的竞争愈演愈烈。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对人类和平开发利用空间，维护空间安全负有重要责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着眼有效应对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突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这个战略重点，着力增强新质作战能力。空间安全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领域，加快空间力量发展顺应了国际安全形势变化和国家利益拓展需求，是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使命。

加快发展空间力量势在必行

空间力量建设是我国向航天强国迈进的必然趋势。空间力量是一个国家为实现其战略目标，所具有的从事和影响空间活动的综合实力，它是民族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957 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进入太空，世界军事强国竞争获取空间优势的帷幕从此拉开。我国自 1970 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至今，航天力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在世界航天领域始终保持了较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特别是伴随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的深入推进，我国的科技实力和国际地位一次次被推向崭新的高度，一步步确立了航天大国的地位。当前，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发展建设与我国大国地位和国家利益相称的强大空间力量，既是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维护国际空间安全，促进人类和平开发利用太空的使命担当。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坚定信心信念，强化使命担当，以关键领域突破为引领，加快创新发展，全力推进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的转变。

空间力量建设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体系的必然使命。伴随新军事变革的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竞相调整军事战略，加紧推进军事转型，竭力抢占军事竞争“制高点”。这场新军事变革，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空间力量的广泛应用和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强。为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趋势，提高我军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和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能力，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要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体系。空间装备对现代信息化作战力量的运用发挥着体系性支撑作用，空间力量以其战场的自由广阔性、作战力量的高度机动性、信息支援快速有效性，以其为代表的新型作战力量在现代军事力量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必须把空间力量建设摆在重要战略位置，为我国应对复杂的国际竞争格局、打赢信息化战争提供有力支撑。

空间力量建设是现代条件下信息化战争的战略支撑。上世纪 90 年代的海湾战争是空间力量用于作战行动的开端，这场战争使全世界见证了空间力量对信息化战争的巨大贡献，也全面奠定了空间力量在信息化作战中的重要地位作用。自此，空间力量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新生力量，战争形态全面向陆、海、空、天、电、网多维一体的体系对抗发展。近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更加表明，空间力量能够实现对信息获取、传输、利用的空天化和实时化，能够将多维战场联接成一个整体，能够实现快速机动和精确打击，它既是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支撑，也是一体化联合作战的关键要素，更是实施空间攻防、夺取制天权的主体力量。因此，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必须大力加强空间力量建设，发挥空间力量在一体化联合作战中的信息支援、体系支撑和战略攻防作用，牢牢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坚持军民融合的发展模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重要战略部署，突出强调要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空间力量作为国家航天体系和军队新型作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发展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指示精神，以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利益拓展的重大需求为导向，加紧在国家层面建立推动空间力量建设军民融合的体制机制。

发展观念上的融合。综合国力是空间力量建设的基石，发展空间力量是国家科技水平、工业基础、经济实力及民族科技创新能力的综合体现，空间力量的发展建设又有力地带动了国家科技、工业、经济和社会的创新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更要坚持走军民融合的发展道路，树立空间力量建设一盘棋的思想，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军事科研部门、航天工业部门等各方面力量拧在一起，充分发挥社会总资源的综合使用效益，实现统筹兼顾、深度融合、协调发展。

战略指导上的融合。空间力量建设涉及诸多高精尖技术领域和专业方向，行业部门众多、技术实现复杂、应用领域广泛。要坚持将空间力量建设纳入国家发展建设的总体规划和战略全局，从国家战略层次对军民用空间资源的发展统筹规划、统筹科研、统筹生产、统筹应用，形成发展合力。要坚持把服务国民经济建设与构建空间安全体系相统筹，实现互相带动、互相补充。要坚持把发展军用空间技术与发展民用空间技术相结合，打破行业垄断，形成技术竞争的良好态势，既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在民用空间技术发展方面的推动作用，也充分利用国家体制在集中力量发展军用空间技术方面的优势，不断加快空间技术进步的步伐。

建设应用上的融合。加强军地技术交流，打破力量分散、独家经营的封闭科研模式，拓宽军队与地方生产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技术合作与交流渠道，努力实现共同研发、成果共享、相互促进。要统筹军地资源，加快推进现有资源的整合，各有侧重、相互补充的配置和发展军地资源，减少重复建设和分散建设，实现国家资源利用效益的最大化。要坚持寓军于民，研究建立军民相互协作、相互协调的体制机制，形成运转高效的军民融合联动体系，使军用、民用航天资产互为补充、互为加强，确保空间力量建设、国民经济建设各类资源信息的高效互通和良性互动。

建立中国的国家空间力量体系

我国的空间力量建设开创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两弹一星”事业，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已经形成集航天装备研制、发射、测控、运行管理和应用于一体的科研生产和装备运用体系，为我国空间力量的建设奠定了基础。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空间力量已经成为我军新质作战能力建设的重要领域，要求我们必须按照战场建设的高度，发展空间装备、培育作战能力、创新军事理论、实施人才战略。

加快现有资源的整合利用。资源整合是空间力量建设的必由之路，是提高空间作战整体效能的有效途径。现阶段应立足现有编制体制，从资源整合入手，运用信息化的技术手段，按照功能进行模块划分，建立资源共用、应急征用等机制，实现相关资源的统一调度和集中保障。

建立基于信息网络的一体化指挥体系。管理网络和信息平台是提高推动体系融合的基础，只有通过网络聚合，才能实现空间力量各要素的紧密关联，形成整体作战优势。推动空间力量整合发展，应当贯彻基于信息系统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加快构建天地一体、广泛互联的信息网络。把信息共享作为建设重点，建立空间信息分类获取、集中处理、定制分发的管理保障机制，形成全面融合、开放共享的信息系统，最大限度发挥空间力量的整体效能。

积极开展空间力量运用研究。要紧贴一体化联合作战任务需求，加强空间力量运用规律研究，加强理论创新，加强演示验证，科学设置主题，组织联合攻关，切实增强空间应用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逐步形成指导我国空间力量运用的理论体系。

重视培养空间应用专业化人才。发展好我国的空间力量，必须坚持人才先行的理念，培养一批推动空间技术创新发展、满足空间作战需求的优秀人才。要以满足实战需求为标准，科学确立人才培养目标，合理设计人才培养方案，着力建设一支结构合理、能力全面的专业化空间人才队伍。要突出抓好空间科技领军人才培养，走开军民融合式人才培养路子，深化项目成果人才一体化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快速成长发展。要注重空间作战指挥人才培养，在航天发射测控、一体化联合作战演习和实战化军事训练中发现、检验和培养人才，着力强化信息素养，提高组织指挥作战能力，为履行未来空间攻防作战任务做好人才储备。

◆国防视点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难在哪里

□包敦典 薛 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战略决策，对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作出部署。坚持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准确把握制约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挑战，是把国防和军队改革引向深入的战略举措。那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深在哪里，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和困难呢？

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难以转变

落后的发展观念是制约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思想观念上的枷锁，比实际工作中的障碍更难打破。我军各部门独立发展的特殊经历，形成了“自我保障”“独立发展”等观念。这种传统观念与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利益机制相结合，又形成了基于经济利益的“本位主义”观念。实践中存在的重复建设、部门所有、资源闲置浪费、改革中强调所谓“客观困难”等，都是观念的障碍。因此，在军民融合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过渡阶段，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融合发展的思想观念。以确立融合发展新观念为起点，千方百计增强全民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意识，破除对融合发展的各种误解，树立开放式发展观念；破除国防建设由政府和军队包办的观念，树立社会力量共办国防的观念；破除国防建设只能由计划调控的观念，树立市场竞争观念；通过解放思想，凝聚改革共识，增强改革信心，最大程度唤起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热情。

顶层规划的融合机制难以构建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必须在国家层面建立相应的规划机制，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规划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科学的规划机制是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国防和军队建设快速有效发展的重要路线图。国防和军队建设深深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必须通过科学的规划机制。目前，国家层面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机制已经形成包括论证、制定、审议、执行、报告等环节在内的程序和方法，对于全面深化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规划一直处于国家的规划体系之外，而且在制定程序和方法上，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有很大差异。由于缺乏规划衔接，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防和军队建设脱节，使经济社会发展难以贯彻国防要求，国防和军队建设难以深度融入经济发展。同时，也使国防和军队改革与国家全面改革不同步，给国防和军队建设造成了许多新的困难。要实现军地两大规划机制的衔接，必须实现三大融合。一是机构融合，国家和军队的规划计划机构都要吸收对方的有关部门和人员参加，对涉及军地双方的重要领域的发展规划和重大项目的确立，军地双方要共同研究论证。二是内容融合，国家和军队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涉及军地双方的内容要相互衔接配套，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逐步使国防和军队发展规划真正成为国家发展规划的组成部分。三是程序融合，要强化军地相互沟通的环节，统一有关内容的审批权限，协调规划计划制定的周期。

长期形成的发展体制难以改革

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地方的相对独立首先在于体制分割，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必须在源头上形成宏观体制框架，突出体制调整重点，从根本上保证融合式发展模式的建立。近些年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实践表明，体制分离是制约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关键。体制障碍解决不了，许多深层次问题就难以解决。但体制改革也是最复杂、最困难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处于攻坚期、深水区，必须在深化军民融合发展体制上有突破，逐步攻破众多体制障碍。在改革重心上，要突出国防工业体系、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制、国防科研生产管理和武器装备采购体制、国防动员体制、民兵预备役体制和边海空防管理体制改革，着力破除各种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中国特色军事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在改革方式上，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科学论证，审慎决策，稳妥实施，以军事需求推动体制机制改革，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军民融合质的跃升，使军民融合向着更高水平和更具活力的发展体制方向迈进，不能甘于维持现状，不能让现行的体制固化下来，成为融合发展的阻力。

融合主体的利益藩篱难以打破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不能仅靠融合发展主体的国防意识，除了认识的深化和决心的坚定之外，还要有各种条件的准备。我们不能一味地把融合难归罪于协调部门的不积极，这里还有一个利益的调整问题。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资源统筹配置的过程。资源的统筹配置必然要调整改革原来的利益分配方式，必然要触动既有利益格局，削弱一部分人获取利益的权利和机会。这就难免使深化改革举措引起反弹，产生阻力。所以，对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我们应有更求实的认识，改革就可能有不同利益的诉求，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要平衡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然后统筹地去推进这种改革。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改变过去习惯于用行政手段调配资源，不善于利用市场机制的做法。在综合衡量各方利益关系的基础上，让市场决定资源的价格、流向，通过竞争决定企业的参与程度，从而优化融合资源的配置结构，提高融合资源的配置效率，实现融合资源的使用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要找准国家、军队、企业利益的契合点，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合力。比如：在基本建设中贯彻国防要求，需要增加一定的成本；民用技术军用以及民用企业进行武器装备研制生产，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为此，要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使融合发展具有稳定而明确的利益补偿渠道。我国目前有 13 万家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很多高新技术企业在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产业方面都与传统军工企业相比肩，有的技术水平甚至高于十大军工集团，但是却只有 550 家民营企业进入军工行业。因此，为了提高社会力量参与国防建设的积极性，我们既要让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各个单位树立全民建国防的观念，又要在制度设计上实现公共利益与部门、企业利益的结合，实现军民融合的责任驱动与利益驱动相结合，出台规范的融资投资、风险补偿政策，吸引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国防和军队建设。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一个大战略，当前正处于军民深度融合速度提升期、融合结构调整阵痛期、融合政策深度调整期，必须以啃硬骨头、涉险滩的勇气勇往直前，坚定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横下一条心深化改革，我们相信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新格局一定能够加快形成。

◆军队建设

莫把“长板”当累赘

□夏 凉 单成之

黎以战争中号称“世界防护能力最强”的“梅卡瓦”主战坦克，在黎真主党游击队面前损失惨重，参战的 400 多辆各型“梅卡瓦”，有 50 辆被击中，造成大约 30 名乘员死亡。被真主党反坦克武器击中的“梅卡瓦”有 45%被穿透，而且以色列士兵大部分都死于坦克被摧毁。这一事实足以让以军汗颜，因为“梅卡瓦”重要的设计理念就是最大限度保护乘员生命，坦克不仅采用了最先进的装甲防护技术，还设置了从后部逃生的舱门。

雄狮缘何像羔羊一样任人宰割？“坦克本身的防护设备相当有效，如果操作得当，死伤人数应大量减少。可是，坦克上有许多系统在战时根本就没用上。”一名以色列高级军官一语破的。可见，造成“梅卡瓦”不堪一击的主要原因不是装备不先进，而是以军不会用。“梅卡瓦”能够制造烟幕，遮蔽敌人视线，这是重要的生存手段，但在萨鲁基村战斗中由于坦克手不懂如何开启制造烟幕装置，致使 401 旅的 24 辆“梅卡瓦”坦克被真主党反坦克导弹击中。以军战后调查认为，造成坦克手不能熟练操纵坦克的主要原因是，指挥员日常训练时让他们实际操作时间太少。一名以军军官说：“整个 401 旅过去一年一直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执行任务，大多数情况下不开坦克。他们更没有为准备在黎巴嫩地区作战进行战前训练。”没有摸透装备的脾气，不了解手中装备的功能便上战场，难免失利。

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一批信息技术含量较高的新装备落户部队。作为新军事变革的核心要素，新装备是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重要物质基础，是信息化建设中的“长板”。强化新装备训练既是部队战斗力新的增长点，也是推进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转变的基础环节之一。然而，由于这些新装备操作复杂，对人才及配套设施要求苛刻，缺乏配套的教材和相应的训练计划、组训规范、考核标准，导致部分单位将配发的新技术装备“打入冷宫”，平时训练能不动就尽量不动，创新的新装备战法训法也被束之高阁，部队建设的“长板”一时成了制约战斗力提高的“短板”。

只有新装备在未来作战中切实发挥出“拳头”作用，带动老装备训练方式和作战方法的创新，才能让“长板”不再屈辱受冤，实现部队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

◆国家安全

全球治理模式下的国家安全

——访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刘慧

□本报记者 程冠军

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并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这是党和国家在国家安全方面的重大战略决策，对此您怎么理解？

刘慧：我们可以看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有 9 个地方提到国家安全问题，全会决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而且第一次提出“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把国家安全提到一个历史的新高度。当前，在全球化进程当中共享安全已经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诉求和理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作为中国必须思考在全面开放的今天，我们怎么能够为全球创造一个共同治理合作安全的环境，中国也需要这样一个合作安全的环境来保证我们加快经济建设的脚步。因此，我们要在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全球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探索中国面对安全挑战的应对之策，从而实现共享安全与全球治理，这一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记者：我们看到，进入 2013 年以来，全球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国际形势正在发生自冷战以来极为深刻复杂的变化。这种复杂变化的突出表现有哪些？这些变化又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刘慧：这种复杂和深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长期占主导地位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比如我们以 2013 年的购买力评价来计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和发达国家第一次出现了持平，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根据评估，2015 年金砖五国的经济总量将赶上西方五国，按照预测，到 2030 年金砖五国经济总量将超过发达国家的西方七国。二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在较量的场所因素方面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比如过去是在三大传统因素战略要地、战略资源、战略主导权上进行战略争夺，从近期开始我们发现已经扩展到太空、网络以及海洋，这些也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特别是作为我们中国，西方国家在发展的时候重路权也重海权，我们国家传统上一直只重路权但忽视海权，现在我们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海上的利益也是我们必须要争取的内容，当我们在争取这个利益的时候必定会触动到其他国家既有的利益和现有的格局，这些必须引起我们高度关注。比如我们在未来发展上，中央也提出要建设海上丝绸之路，这更能说明我们需要用保护海洋的权益来保障我们整体上的国家利益。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安全问题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同时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也给我们国家安全理论研究提出了新任务和新课题。您认为，我们在国家安全研究方面应该关注什么？

刘慧：我觉得 2013 年是我们迎来国家安全理论研究的黄金之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家安全的内涵作出了深刻的阐释，并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新词。对此，我们要以开放促改革，在全方位上要更快地加快对外开放。如，建立中国上海自贸区，加快和扩大自贸区建设；加快同有关国家地区商签投资协定，扩大投资合作空间；要加快延边开放步伐；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建设海外的银行；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也包括我们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等等。总之，下一步将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那么这种新格局也为我们国家安全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这就是国家安全理论研究要具有全球视野和开放视野。

记者：从目前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可以看出，在全球治理模式下，国家安全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在机遇和挑战面前，我们应该如何选择？

刘慧：到 2013 年年底，我们进出口贸易将成为世界第一，过去我们是出口第一，进口第二，2013 年我们进口贸易将跃升为世界第一。再有，我们拥有 1.3 万亿美国国债，我们在投资方面过去是以吸引外资为主，到 2013 年可能我们的对外投资和对内投资的数量将持平，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再有，我们现在每年进出口进出国进出境的人数也是突破性的、历史性的，一年有 360 万人在进出境的过程当中，在天上飞，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 1 万人进出国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保证国家利益、争夺国家利益，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商场上都需要思考。

如果说我们面对的新形势是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的话，那么我们进行国家安全理论的研究应该是挑战前所未有、机遇前所未有。全球安全的形势是一个综合体系，它包含国际安全与全球治理、海疆安全与国家权益维护、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理论的探讨、新型大国关系与国际安全、反恐与国际安全、非传统安全、世界与中国非传统安全信息与文化安全等诸多安全因素。如何建立一个新型的、适合我们国家发展需要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和全面的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机制，这是我们的使命与责任。